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On Learning and Ideolog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 清代以来的学术 与思想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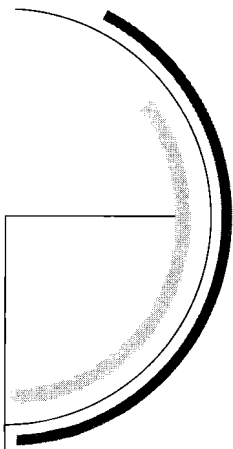
史革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On Learning and Ideology since the Qing Dynasty



# 清代以来的学术 与思想论集

史革新◎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论集 / 史革新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8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2521-4

I. ①清… II. ①史… III. ①学术思想-思想  
史-中国-清代-文集 IV. ①B249.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1401号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清代以来的学术与思想论集·

著 者 / 史革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3号楼华龙大厦

· 邮政编码 / 100029

·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责任编辑 / 宋培军 姚晓晖

责任校对 / 白秀君

责任印制 / 岳 阳

印 装 / 北京季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20 印 张 / 21.2

版 次 / 2011年8月第1版 字 数 / 365千字

印 次 / 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2521-4

定 价 / 65.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出版说明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如今，北师大历史学院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镇，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科研实力颇为雄厚，在学术界声誉卓著。

在北师大历史学科中，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举足轻重。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高校最早设立的学科点之一，在几代人的辛勤耕耘、不懈努力下，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学科建设长足进步，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一方重镇。该学科点是国内最早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和博士学位授予权并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单位之一，也是北京师范大学设立的首批校级重点学科之一。

近年来，北师大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陆续完成了一批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这些成果，繁荣中国近现代史学术园地，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组编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学术探索无止境，作为探索旅程中的专业研究成果，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1年3月

# 目 录

|                          |     |
|--------------------------|-----|
| 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         | 1   |
| 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         | 18  |
| 明末清初陆王心学变化趋向探究 .....     | 38  |
| 略论清前期理学的复兴、作用和影响 .....   | 65  |
| 略论清顺治年间程朱理学的涌动 .....     | 87  |
| 清顺康间理学的流布及其发展趋势刍议        |     |
| ——以清初理学士人编刊的学史著述为例 ..... | 103 |
| 理学与晚清社会 .....            | 117 |
| 近代来华传教士与儒学的关系 .....      | 129 |
| 清入关前对汉文化的初步吸收            |     |
| ——以努尔哈赤推行的文化政策为例 .....   | 145 |
| 略论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外传 .....     | 156 |
| 太平天国失败文化因素初探             |     |
| ——兼论洪秀全和曾国藩文化政策的得失 ..... | 180 |

|                             |     |
|-----------------------------|-----|
| 甲午战后中日学术文化交流                |     |
| 流向转变初探 .....                | 195 |
| 义和团运动与近代思想启蒙 .....          | 211 |
|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传播 .....          | 226 |
|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          | 241 |
|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特征之我见 .....         | 256 |
| 近代中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形成浅议 .....       | 263 |
|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性光大 .....      | 276 |
| 李颀理学思想略论 .....              | 292 |
| “廉吏”汤斌理学思想略议 .....          | 309 |
| 浅谈徐继畲与福州神光寺事件 .....         | 324 |
| 论薛福成的思想发展 .....             | 331 |
| 李端棻与晚清教育改革 .....            | 358 |
| 严复科学民主思想议略 .....            | 374 |
| 孙中山论弘扬民族精神 .....            | 389 |
| 从周恩来评胡适的文章看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分化 ..... | 398 |
| 编后记 .....                   | 416 |

## 清初学术思潮转换刍议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鼎革易代之变，也使学术思潮处于一个新的历史转换关头。明代学术，几经变迁，经历了程朱理学、王阳明心学以及对王学末流的反思批判等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尤其在晚明，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国家的衰败和王学流弊造成的空疏浮华之风，开始对王学进行反思，寻找新的思想出路，致使思想学术领域出现了若干新的发展动向。到清初，经历了鼎革之变的宿儒遗民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依然很强劲，用梁启超的话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sup>①</sup>他们在继续晚明学术风气的基础上，反思现实与历史，并积极探索新的学术出路，为清初学术发展开出新的格局。就清初学术思潮的转换而言，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处于自我调整中的学术主潮——理学发生“由王返朱”之转换；经学复兴反映出“由宋返汉”之转换；诸子学兴起体现“由经返子”之转换；经世致用思潮流行展现“由虚返实”之转换；西学传播昭示“以中纳西”之转换。尽管有的转换仅是昙花一现，并未彻底完成，但也展现出明清之际学风发展的时代特征。正如谢国桢所说：“明末清初的学者，有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风格。”<sup>②</sup>

---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中华书局，1989，第16～17页。

②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第1页。

## 一 由王返朱：理学内部结构调整的转换

无论在晚明，还是在清初，理学都是影响最大的学术流派。理学中的两个基本派别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在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晚明时，学术界抨击王学末流，促使王学营垒发生分化，出现了修正王学的派别。但这派学者并不改变王学宗旨，只是对王学流弊不满，试图通过重新解释王学或者调和程朱、陆王来克服其弊，达到振兴的目的。以刘宗周为代表的浙江蕺山学派即属于前者。蕺山学派的许多人都见存于清初，黄宗羲即其中的佼佼者。北学宗主孙奇逢、关学宗主李颙都是学宗陆王的大家，亦不排斥程朱，并力主二者调和，体现了王学在清初新的发展动向。在学界怀疑、批评王学的冲击下，原来的王学群体发生了分化，出现了宗陆王、宗程朱、调和陆王与程朱等不同的走向，王学无可挽回地走向了衰落。

与王学衰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程朱理学的兴起，程朱理学被人们视为救治王学弊病的重要选择。尽管程朱理学也遭到人们的质疑，但它所受到的批评与压力要比王学轻得多。随着王学遭受士人的质疑，学界出现了由王返朱的新动向。标榜程朱理学的学者开始活跃起来，在北方，明末陕西的冯从吾、山西的辛全等学者都以标榜朱学而自居，清初北方理学家李颙、范梈对他们的学说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在南方，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学派则是提倡程朱理学的劲旅。梁启超说：“当晚明心学末流猖披之时，而东林学派，兴于其间。创之者为无锡高景逸攀龙、顾泾阳宪成，以省身克己砥砺名节为教，而最留意于当世之务。学派之得名，则以无锡东林书院为二公讲学地也。其后阉孽以此名陷正人，‘东林党’遂遍天下。其后继者曰复社，主之者则太仓张天如溥，虽流品渐杂，要不失为历史上有价值之讲学团体。”<sup>①</sup> 东

<sup>①</sup>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第61页。



林学派的余脉一直延续到清初。高攀龙的后人高世泰、高愈都是该学派在清初的著名传人，对程朱理学多有阐发。

程朱理学不仅为部分士人所提倡，而且还得到清朝统治者的支持，这是它得以复兴的重要社会政治条件。康熙帝亲政后，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朝野人士，上下呼应，使程朱理学的地位迅速上升。继续以程朱理学为教育及科举考试的宗旨和准绳、大量刊布程朱之书籍、擢拔重用理学官僚、抨击王学等“异端邪说”、完善日讲及经筵制度直至康熙帝升享朱熹于十哲之列等都是程朱理学复兴的重要表现。处于发展巅峰时期的程朱理学，其学者之众、著述之多、影响之大，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无可匹敌的。宗程朱理学者格外活跃，涌现出诸如陆世仪、张履祥、吕留良、魏裔介、魏象枢、熊赐履、陆陇其、李光地、张伯行等理学名家。这表明程朱理学在清前期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学界的主流学术。

## 二 由宋返汉：经学复兴的转换

明正德、嘉靖年间，士人杨慎好古学，著《丹铅总录》、《升庵内外集》等书，博考所收诸物，其论虽然欠精，但于向来忽视考据之学的明代学坛来说，不啻一股吹入的新风。学者归有光批评士子进学唯知追求功名利禄，而“以通经学古为拙”的恶俗，强调学习《六经》的重要性，指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六经》之言，何其简而易也！不能平心以求之，而别求讲说，别求功效，无怪乎言语之支，而蹊径之旁出也。”<sup>①</sup>他还提出，“明圣人之道”必须从“明圣人之经”为始，“汉儒谓之讲经，而今世谓之讲道。夫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道亦何容讲哉？凡今世之人，多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sup>②</sup>继归氏之后，焦竑、陈第、钱谦益等都于经学、考据学多有提倡。陈第

①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册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50页。

② 归有光：《震川先生集》上册卷7，第195页。

《尚书疏衍》4卷，即从考证入手，纠正诸儒穿凿附会之说，“而实非师心臆断、以空言说经者比”。他著《毛诗古音考》、《屈宋古音义》诸书，“皆援据该洽，具有根底”。<sup>①</sup> 陈耀文鉴于“心学盛而经学衰”，著《经典稽疑》，取汉、唐以来说经之异于宋儒者，分条辑载，辨明本意，于汉儒多有表彰。陈耀文认为：“欲存诸经古训，但当采郑、王、贾、孔遗言，不应杂以明人议论。”<sup>②</sup> 又著《正杨》、《翼杨》等书，纠正杨慎著作中的错谬。他们的著述已经具备了考据学的风格。<sup>③</sup> 钱谦益对汉代经学颇有好感，强调治经者应以汉儒为宗，曾说：“《六经》之学，渊源于两汉，大备于唐、宋之初，其固而失通，繁而寡要，诚亦有之，然其训故皆原本先民，而微言大义，去圣贤之门尤未远也。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代为宗主，如杜预所谓原始要终。”他又说：“学者之治经也，必以汉人为宗主。汉不足，求之于唐；唐不足，求之于宋；唐宋皆不足，然后求之于近代。”<sup>④</sup> 因此有学者把钱谦益对“通经汲古”的阐发称为“为经学在清代的复兴奠定了理论基础”。<sup>⑤</sup>

清初，一些学者不愿固守理学的狭隘天地、掇拾宋儒语录之糟粕，于经学情有独钟，遂为经学研究的开展推波助澜。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毛奇龄、朱鹤龄、陈启源、阎若璩、胡渭等人为清初提倡经学的代表人物，其中以顾炎武提倡最力，也影响最大，如梁启超所言：“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sup>⑥</sup>

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初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早年曾参加复社。明亡后，清兵南下，他在家乡参加抗清斗争。后北上，历

① 永瑤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卷12，中华书局，1997，第156页。

② 永瑤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上册卷33，第432页。

③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第41页。

④ 钱谦益：《钱牧斋全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1706页。

⑤ 王俊义：《清代学术探研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第82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53页。

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终其后半生过着漫游的生活。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他结识了许多著名学者，切磋学问，从事著述。他提倡经学的前提是对明末王学末流流弊的批判，声称：“盖自弘治、正德之际，天下之士厌常喜新，风气之变，已有所自来。而文成以绝世之资，倡其新说，鼓动海内。嘉靖以后，从王氏而诋朱子者，始接踵于人间……故王门高弟为泰州、龙溪二人，泰州之学，一传而为颜山农，再传而为罗近溪、赵大洲。龙溪之学，一传而为何心隐，再传而为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论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以为一世之患轻，历代之害重，自丧之恶小，迷众之罪大。”<sup>①</sup>在他看来，王学末流是舍弃圣人之学的本旨而言心性，“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sup>②</sup>而古圣人之学则是以经为本，以用为归。他对圣人之学作过这样一段精彩的阐释：“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sup>③</sup>他对经学的看重由此可见。在此基础上，顾炎武提出“理学即经学”的命题，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sup>④</sup>在这里，他不仅批评“今之理学”为禅学，而且指出圣人之学的根本是经学，理学只是末流，由理学向经学回归才是挽救圣学的出路。于经学，他不仅口头提倡，而且提出一整套研习的思路与方法，如博学于文、注重读书、经世致用、躬身实践等。诚如论者所言：“先生讲求经世之学，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与

①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1421~1422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册，第1359页。

③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册，第1390页。

④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58页。

前史旁推互证，而折其中于《六经》。”<sup>①</sup> 他的《日知录》凡 32 卷，于经义、史学、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类，“一一疏通其源流，考证其谬误，最有补于学术世道”，<sup>②</sup> 亦体现其博学、精审的考证之功。顾氏关于经学的其他著述还有《音学五书》、《左传杜解补正》、《九经误字》、《五经同异》等。顾炎武关于经学的提倡与著述，对清代经学的兴起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早年以反对阉党而闻名。明亡后，曾参加抗清斗争，清廷诏征博学鸿儒，辞不就。康熙六年（1667），邀同人重开其师刘宗周所创之证人书院讲会。次年，于宁波创设证人书院，造就弟子众多，为浙东学派之巨擘。他的学术尽管出于王学，与有朱学背景的顾炎武迥异，但在反思王学流弊、寻找新的学术出路的问题上，二人殊途同归。黄宗羲对于空谈、虚妄的习气深恶痛绝，激烈抨击理学末流：“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薄文苑为词章，惜儒林于皓首，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其规为措注，与纤儿细士不见长短！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尤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岂非逃之者之愈巧乎？”<sup>③</sup> 他主张以风格平实的经学、史学来挽回日趋衰败的学风，强调治学要以经术为源本，以经世致用为宗旨，以空谈蹈虚为警戒：“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不读，但从事于游谈。学者必先穷经，经术所以经世，乃不为迂儒。”<sup>④</sup> 所著《易学象数论》、《授书随笔》等书于《易经》、《尚书》多有发明。考据学家阎若璩尝就学于黄门，黄宗羲为他生平最服膺的学者之一，所撰考据学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就受到黄宗羲的启发。黄宗羲对于清初经学的提倡，功不可没。全祖望评论说：“自明中叶以后，讲学之风已

①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第 3 页。

②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 4 页。

③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10），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 645～646 页。

④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中华书局，1983，第 126 页。

为极敝，高谈性命，直入禅障，束书不观，其稍平者则为学究，皆无根之徒耳。先生始谓：学必源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sup>①</sup>

谈到清初经学，毛奇龄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学者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人。曾于康熙十八年（1679）应试博学鸿词科，列二等，授翰林院检讨。博学多闻，尤长于经史，著述宏富。梁启超说：“西河有天才而好立异，故其书往往有独到处。”<sup>②</sup>毛氏论学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是激烈抨击程朱理学，二是提倡学风朴实的经学。其所著《太极图说遗议》、《河图洛书原舛篇》等篇揭穿了宋儒以道士陈抟臆造的河图、洛书篡改《易经》，用道家之说解经的谬误。他写的《四书改错》痛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所有论点，认为该书“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sup>③</sup>在清初理学尚有一定影响的情况下，毛奇龄对理学的大胆否定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影响。在批判理学的时候，毛奇龄对经学持肯定态度，并予以提倡，强调“以经解经”的治学方法。他说：“予之为经，必以经解经，而不自为说。苟说经，而坐与经忤，则虽和汉、唐、宋诸儒，并为其说，而予所不许。是必以此经质彼经而两无可解，夫然后旁及儒说。”<sup>④</sup>他写的经学著作很多，主要有《推易始末》、《诗传说议》、《春秋简书刊误》、《春秋毛诗传》等数百卷。阮元在《毛西河全集后序》中称许毛奇龄于清代考据学有“开始之功”，<sup>⑤</sup>梁启超对毛奇龄《仲氏易》的评论颇为中肯，称该书“驳杂的地方也很多，但提倡汉儒——荀爽、虞翻诸人的易学，总算由他开创。后来惠定宇之《易汉学》，却受他的影响。”<sup>⑥</sup>

① 朱铸禹校注《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059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171页。

③ 毛奇龄：《四书改错》卷1，嘉庆十六年学圃重刊本。

④ 毛奇龄：《经义考序》，《西河文集》卷29，康熙间刻本。

⑤ 阮元：《研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第543页。

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171页。

此外，王夫之《周易外传》、《尚书引义》、《书经稗疏》、《诗经考异》，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易经说略》、《诗经说略》，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朱鹤龄《诗经通义》、《周易广义略》、《春秋集说》，黄宗炎《周易象辞》等书都是清初强调经学研究的著作，对经学的提倡进一步发展起了较大作用。

### 三 由经返子：诸子学兴起的转换

明代中后期，一些学者在反思理学、探索学术出路的同时，把目光转移到诸子学方面，寂落已久的诸子学研究开始活跃起来，论及诸子学的著作时有问世，如焦竑的《老子翼》3卷、《老子考异》、《庄子翼》、《庄子阙误》，陶望龄的《老子解》、《庄子解》，李贽的《老子解》、《庄子解》、《墨子批选》，以及蒋一彭的《古文参同契集解》等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焦竑等人研究诸子学主要是出于“以诸子补孔、孟”的考虑：“彼老、庄者，生其时，见夫为孔、孟之学者局于有，而达焉者之寡也，以为必通乎无，而后可以用孔、孟之有，于焉取其略者而详之，以庶几乎助孔、孟之所不及。”<sup>①</sup>这种认识有助于学术新领域的开辟。晚明学界关于诸子学研究的开展为清初诸子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初年，诸子学一度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并被纳入研究视野。顾炎武就曾称赞先秦诸子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sup>②</sup>关于诸子学的主要成果有：张尔岐《老子说略》，方以智《诸子燔瘃》、《药地炮庄》，王夫之《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吕览释》、《淮南子注》，傅山《霜红龕集》，以及稍后的徐大椿《道德经注》等。这些著作涉及先秦诸子各家，有的是对诸子典籍的疏通整理，有的则是对其思想的阐发。方以智、王夫之并未像有的正统儒学家那样把老

① 焦竑：《澹园集》（上），中华书局，1999，第138页。

②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838页。

庄思想一概斥为“异端”，而是既有批评，又有肯定，理智分析，有所取舍。王夫之对《老子》批评较多，但对《庄子》多有保留，认为庄子学说与儒家的君子之道有相“通”之处，二者可以互补。如果说方以智、王夫之等人都是站在羽翼儒学的立场上来研究和评判诸子学，那么傅山则进一步主张“经子同源”、“经子平等”以实现诸子学真正的复兴。傅山（1607～1684），字青竹，后改青主，又字仁仲，号石道人，山西阳曲人，明廪生。明亡后，拒不出仕。于音韵、训诂、诗文、书画、医学等无不深究，尤好诸子学，开创清代诸子学研究的新风气。他批评俗儒“尊经抑子”的观念，指出：“经子之争亦末矣。只因儒者知《六经》之名，遂以为子不如经之尊，习见之鄙可见。”他又说：“喃喃孔子、孟子，不称为孔经、孟经，而必曰孔子、孟子者，可见有子而后有作经者也。”<sup>①</sup>他还对“经”与“子”二字的源流演变作了考证，证明二字同源，并无尊卑之分，实际上是在为诸子学正名。傅山对诸子学作过全面的研究，并竭力挖掘其中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如《墨子·大取》主要讲逻辑学的问题，为《墨经》中最难读的篇章之一，秦汉以来几乎无人涉猎，用傅山的话说是“奥义奇文，后世以其不可解而置之”。傅山的《墨子大取篇释》首次为之注释，阐发了墨家的名实异同之辨。他把《大取》中“以形貌命者”解为“实指之词”，“不可以形貌命者”解为“想像之词”，<sup>②</sup>这已经与今天所使用的实体概念（具体概念）、属性概念（抽象概念）的提法相当接近。对于先秦诸子，傅山推崇老、庄，于荀、墨稍有非议；于儒学非程朱而主陆王，并吸收佛家学说。对于傅山的学术成就，杨向奎高度评价说：“青主在明清之际诸大家中别具一格，他一扫北人质朴无华的本色，文才风流，无所不能，梨洲船山为之逊色，而亭林见面后亦称其‘高致’也。”<sup>③</sup>

① 傅山：《霜红龕集》卷38《杂记》（三），宣统三年丁宝铨重刻本。

② 傅山：《霜红龕集》卷38《读子》（四）。

③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一），齐鲁书社，1985，第81页。

#### 四 由虚返实：经世致用思潮倡行的转换

明代后期，面对国事的凋敝和学风的颓衰，一些有识之士在继承前人事功之学的基础上，高举“经世致用”的旗号起而救之。罗钦顺主张“经世宰物”，王廷相认为“惟实学可以经世”，经世与务实精神已见端倪。东林学派为纠正王学的空疏之弊，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经世致用精神。顾宪成说：“至于论学，特揭出‘躬行’二字，尤今日对病之药。”<sup>①</sup>高攀龙也指出：“学问必须躬行实践方有益”，“学问不贵空谈，而贵实行也。”<sup>②</sup>他们都把经世致用思潮向前推进了一步。晚明的经世致用思潮不仅体现在学术思想上，而且及于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徐光启致力于经世致用，以“富国强兵”为追求的目标，考察农业水利、天文历法，编著《农政全书》。陈子龙等编辑《明经世文编》504卷、冯应京编《皇明经世实用编》28卷等书，总结有明一代治国安邦的方法与经验，是体现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代表作。此外，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等都是从不同角度阐扬经世致用思想的。晚清由有识之士所倡导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而是继续发挥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清初诸大家丰富而深刻的学术思想就受到了晚明经世思潮的滋养。

以经世济民为志，探求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学问，是经世致用思潮的一个显著特征。对此，顾炎武有明确的说明：“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sup>③</sup>“经世致用”便是他思考学问、著述为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基于此，他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主张，把经世致用精神融入治学、论文之中，指出：“文之不可

① 顾宪成：《泾皋藏稿》卷5《简邹孚如吏部》，光绪三年泾里宗祠刻本。

② 高攀龙：《高子遗书》卷4《讲义·知及之章》，清末重刻本。

③ 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第48页。



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sup>①</sup>本着这种精神，顾炎武于经史百家、音韵训诂、国家典制、礼仪风俗、兵农财赋、天文舆地诸学，无不深究。《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便是体现经世致用精神的代表作。与顾炎武相同，黄宗羲治学也抱有以“万民之忧乐”为重的博大胸怀，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sup>②</sup>他的《明夷待访录》就是在深入考察社会利弊得失和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论述了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问题，为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被梁启超誉为“人类文化之一高贵产品”。<sup>③</sup>方以智论学同样贯穿经世致用精神，强调“实学”、“实讲”，称：“治在君相，人在师教，学在实讲，公明而已。不明时势而执成式者，迂腐之弊愚。”<sup>④</sup>为此，他不仅主张读经史，而且提倡讲求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有用之学，包括“学校、选举、赋役、兵屯、河槽、盐钱诸事，利弊时宜，贵知要略”。他的《通雅》、《物理小识》等著作，无不闪耀着经世致用的思想火花。

然而集中体现清初经世致用精神的还是颜李学派。颜元和李塏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颜元摒弃理学，一意讲求经世致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习行经济”之学。他对宋儒鼓吹的“静坐读书”、空谈心性深恶痛绝，并抨击朱熹的学说背离圣人之道，是把人们引入歧途的“迷魂”汤。颜元在主持漳南书院的过程中，贯彻了经世致用思想，把许多实用性的知识如科学、生产、军事、文学等门类都列为学生学习的必修课程，如礼、乐、书、数、天文、地理、攻守、阵营、陆水战法、射御、技击等科无不在讲授之列，其对经世致用之学的提倡可谓不遗余力。

①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册，第1439页。

②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1），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第5页。

③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46页。

④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二，康熙五年春草堂刊本。